

灵台县梗概

孙振宇

一、概 况

灵台县位于黄土高原南缘陇东地带，属关山支脉泾河流域。东邻陕西省长武、彬县，南接麟游、千阳、陇县，西连崇信，北依泾川；总面积1991.51平方公里；辖16个乡（镇）227个村委会，人口21.02万。其中回族7千余人。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向东倾斜。境内平均海拔1205米，最高处龙门牛宅原海拔1520米，最低海拔890米。境内有7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属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寒冷，干旱少雪多晴天；夏季时短凉爽，雨水集中多洪雹。年平均气温8.6℃。降雨量650.4毫米，平均日照时数6.7小时。无霜期159天。主要自然灾害有干旱、冰雹、洪灾。

境内有达溪河、黑河，均属泾河水系，年总径流量2.42亿立方米。达溪河由西向东流经6个乡（镇），境内流长85公里，流域面积1342平方公里，有32条小河及沟水支流汇入。黑河境内流长28公里，年径流量0.89亿立方，流域面积602平方公里。本县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高粱、豆类；经济作物有胡麻、冬油菜、麻籽、荏籽等。森林资源中主要有杨、柳、刺槐等。野生植物中药用的主要甘草、冬花、刺五加参、柴胡、杏仁、枣仁、党参、半夏、黄芩等多种。动物有3系列20种。主要有野猪、豹子、狼、狐狸、鹿等。

二、历史沿革

商周时，今灵台境内为密须国和密国属地。秦始皇二十七年

(公元前220年)置鹑觚县(今邵寨镇),属北地郡。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又置阴密县(今百里镇),属安定郡。东汉,废阴密县,鹑觚县先改属安定郡,后改属新平郡。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于境内今梁原一带侨置三水县。献帝兴平元年(194年),鹑觚县改属新平郡。三国魏时复置阴密县,属安定郡。晋代,鹑觚县复属安定郡。十六国时,于鹑觚县置赵平郡,并领鹑觚县,后鹑觚、阴密俱属安定郡。到北魏时,鹑觚又改属赵平郡,阴密县改属平凉郡。西魏,将原州朝那县由百泉县迁治于今灵台县朝那镇,置朝那县,并置安武郡,析置安武县。隋代,省安武郡、安武县入朝那县,后又废朝那县,遂于境内置梁原、鹑觚、灵台县,属安定县。唐时,省灵台入麟游县,鹑觚改属泾州。天宝初,改鹑觚为灵台县,后改属泾州保定郡。昭宗时,灵台、梁原属泾州彰义军节度。天复初,置灵台军、梁原军。五代十国时废军复县。宋时,境内灵台、梁原二县改属秦凤路。元初,省梁原县入灵台县,属泾州。明时,灵台县属平凉府泾州。清初沿用明制,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改属泾州直隶州。民国初,灵台隶属泾原道。1928年废道,直隶甘肃省。1935年至1949年隶属甘肃省第三行政督察区。

1949年7月24日灵台解放,隶属甘肃省平凉地区行政公署。1958年撤销灵台县制,并入泾川县,1962年1月复置至今。

三、名特土产

牛心杏:俗称“接杏”,因形似牛心而得名,主产于中台镇以东的达溪河川区。牛心杏清末就驰名陕甘两省,同治年间曾为朝廷贡品,其果实色泽鲜亮,果肉细嫩汁多味浓,酸甜适口,离核甜仁,单果重80克以上;大者可达百余克,全县栽植面积三千多亩,年产果70多万公斤。

团鱼:又名甲鱼、元鱼,生栖于达溪河、蒲河流域。灵台团

鱼品种优良，肉嫩味美，营养丰富，淡黄色，属中华正宗甲鱼。每百克肉含蛋白质16.5克，脂肪1克，碳水化合物1.6克，灰粉0.9克，是肉品中的佳味，血、甲又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为本县珍贵动物资源之一。1985年建成人工孵化养殖池10亩，投放鱼苗1200个，进行人工繁殖。1993年省地县三级投资310万元，新建高质量甲鱼养殖场一处，9000平方米，其中恒温养殖净水面4000平方米，年产甲鱼18吨，出售甲鱼幼苗26万只，已成为西北最大的人工甲鱼生产基地。尤其是“清炖甲鱼”，是驰名西北的地方名菜。

倒卵叶五加：又称五爪子，倒泡牛。夏花秋实，果呈椭圆形卵球状，境内山区灌木林中普遍生长。自然野生面积23万多亩，藏量在2000万斤以上，其根可入药，有补益强壮之功能，县皇甫谧制药厂已投入“倒卵叶五加”膏、片、剂生产。

冬花：又称款冬花，药用植物，有润肺止咳，下气化痰之奇功。本县冬花品质好，价值高，驰名全国。年采收4万斤以上，畅销全国及国际市场。

八眉猪：是全国重点保护的九大猪种之一，因额上有“倒八字”形皱纹而得名，其特性耐粗放，耐苦寒，抗逆性及母性强，适应性广，育肥后期长膘快，产仔率高，脂肉兼用，肉嫩味香，含水率低，瘦肉率44.3%，蛋白质22.5%。以八眉为母本杂交，其仔猪生长发育优于亲本其它猪种，巴八杂活体重较母本提高132%。杜巴杂较亲本日增重144克，农户普遍饲养。

灵 台

政协文史委

灵台，是灵台县最古之名胜。位于县城中心文化馆院内。据县志载：“灵台筑于周，而县以台名则始于隋”。明《一统志》载：“隋析灵台县，取文五伐密作灵台义”。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废阴密县，分鹑觚置灵台县（治所隐形山下），灵台县名始见于史册，距今1387年。重修灵台记：灵台（县）在周为密须国。朱建唐在《灵台史话》中考证：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泾水及其达溪河流域，就分布着密须、共（泾川）阮（泾河下游）卢（华亭）、虞（陇县）芮（崇信）等方国或部落联盟，密须国是其中比较强大的一方国。公前1076年，即文王受命三年，文王姬昌以“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诗经·大雅·皇矣》）为由，亲率大军出细川（今灵台县城南川）过达溪河，直向密须国。密须国王急忙召集群臣商议，不料左右近臣、将其捆绑，大开城门交给周文王。文王不战而胜，为了庆贺胜利，与民同乐，在回西岐的路上，途径荆山之麓（今灵台县城）筑台设坛，辟“灵囿”、“灵沼”，祭祖谢天，“广播德化”“灵台”便从此留存于世。传说，文王所筑“灵台”在今县文化馆院内，依山面河，座北向南，高约两丈，底宽一丈五尺，顶仅一席之地，台体用土夯筑。台上旧植柏树一棵，人称一百（柏）一个墩，高五、六尺。在此不远的地方还有千军万马曾摆兵设阵过的“文王山”、“文王画卦台”，这里地势开阔，风景秀丽。《水经注》上说：“自泮水北径灵台西，文王又引水为碎雍、灵沼”，其“灵台”实指哪里有争议，但距此极近。还有《封神榜》中姜子牙在灭商立周时筑的“灵台”，也在举目可望的周边岐凤之地，且已无

“灵台”可寻了。左右四方，举国上下惟有“灵台”，在偏壤的陇中之地千年百载地矗立过来。到公元1928年，灵台驻军在修建营房时铲平了周“灵台”。据说，当时还出土了几件商、周铜器（已去向不明）。

1933年，陇东绥晋司令、中央陆军新编第五师师长、灵台人杨渠统（子恒）倡导，县长张东野组织修复“灵台”，1934年底竣工。新修的“灵台”，高三丈八尺，底宽亦为三丈八尺。台上建有八卦亭，亭内供文王塑像。亭顶中间是屋脊形，脊中央有一小塔，塔顶插有高约七尺的柱状铁制饰物；亭檐为簸箕形，四角向内收缩并卷起；檐下八根明柱相互对称，四面置望台合围，亭壁方形，南面为正门，北面有拱洞相通。斗拱飞檐，别致美观，台基为夯土板筑，周身包砖；东西两侧对称的台阶通道，通向南侧腰间的平台，再通亭台；台基四壁镶有各界要员题赠的勒石刊碑匾额及重修灵台碑记凡百三十余件。整个建筑结构严谨、造艺精湛，宏伟壮观，同时台前又建钟、鼓二楼。就在竣工之时，即农历九月十七日，“来两鹤、白衣红顶，绕台飞鸣，栖于孔庙古柏，朝去暮归，如是者三昼夜”，一时轰动了灵台县城，说成“人杰地灵”的征兆。当时由京兆先生将饲养在台右的一对梅花鹿捉来，置白鹤于鹿柏下共摄一影。后又在“灵台”东侧建一半边亭，刻制“白鹤鹿柏图”和“朱子家训图”石碑，嵌于亭壁，命名鹤来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这座“灵台”作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被拆毁，所有构件荡然无存。

1984年10月，灵台县人民政府决定重修“灵台”，1985年10月胜利竣工。新建的“灵台”以灵台民间建筑特色与唐宋古建筑艺术风格相结合，又借鉴了南北朝纪念建筑的格式，以宫厅、楼台、庙殿融铸一体的构架，台高78尺，周回288尺，凌空耸立，气宇轩昂，呈现黄土地本原的色彩，又与葱郁蓬勃的古柏绿树相映

衬，焕发宛然的灵动与生气；拥围在众山之中，傍立于“溪水丁流”（灵台八景之一）之湄，蔚为壮观；镀金镏刻的“灵台”二字耀映熠熠日光，光采夺人。从遥远的地方，便可睹“灵台”雄姿。灵台底层是围着栏杆的白色台基和画栋雕窗，绿色玻璃接檐的楼厅；中层是桔黄色四层楼体，顶层为斗拱飞檐，黄色玻璃盖顶的古殿堂，正中悬有“地灵人杰”的大匾。若临近拾级而上，楼里楼外回旋上升，踏入里面踏实，步出外面空阔。站在“灵台”上，抬眼远眺，正是两山对峙的开阔地带，一望无垠。然后回首、亭门的立柱上挂有“灵昭千古秀，台景万民观”的巨幅对联；走进殿门，周文王端庄慈祥地坐在眼前，两旁是壁画：波澜壮阔的伐密图，刀枪相生，鼙鼓交鸣，马腾旌展，满目一派古战场。另一幅，天高地阔，文王与众军士百姓肃然伫立。两句题幅饱墨赫然“伐密不在兵甲利，安邦还在人心同”。灵台县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重修灵台碑记载：“巍峨灵台倚荆山临达溪苍离翘首观麟游望风翔秦岭云横新台筑成山城添锦旧物光复陇原增辉”。灵台设计精巧、高大雄伟，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灵台”，被拍成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很有反响。灵台是历史的象征，是天地仍然凝结的景观，也是灵台人心灵的升华，自然成了灵台的标志。

难忘的握手

姚 显 儒

1952年国庆节期间，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的一员，有幸在首都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9月25日上午9时许，当我们乘坐的列车徐徐驶入北京永定门站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等20多位领导已在站台等候迎接。

金秋的首都，更显得古朴典雅、雄伟壮观，到处充满着喜庆的节日气氛。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的军人来说，都感到十分新奇。然而，大家都渴望着国庆节的到来，盼望着与领袖们见面，游览观景的兴致并不很高。

28日，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在30日晚接见我们。

日历好不容易翻到了30日，我们也好不容易等到了华灯初照的夜晚。20时许，我们离开住地，到达怀仁堂，并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坐到了指定位置。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21时整，嘹亮的《东方红》歌曲响了起来，大家全体起立。这时，毛主席神采奕奕，面带慈祥的微笑，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步入会场。顿时，雷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毛泽东主席一边走，一边频频点头，同时挥动右手，向大家致意。

宴会开始了。首先，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致了欢迎词和祝酒词，又给每位代表敬了酒。随后，我们代表团也临时选出几名代表，向毛主席敬酒，我便是其中的一员。当走到他老人家跟前的一刹那间，我的心激动得都要跳出来了。我不知道，

我那颤抖的双手，是怎样与那双缔造新中国的手握在一起的。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幸福，总觉得有好多话要向他老人家说，但一句也说不出，只是希望时间能够过得慢一点，好让我多握一会儿这富有魅力的大手。我想着想着，竟忘了向毛主席敬酒。多亏了在场的服务人员提醒，才使我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之中。在向毛主席敬酒时，我动情地说了声“主席，您老人家好？”主席一边微笑着，一边说“好、好”。

开始用餐了，香喷喷的饭菜伴随着腾腾热气在空间弥漫，诱惑着每个人的感官。然而，此刻谁也吃不下去，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主席身上。只见主席习惯地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拿起一块饼干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偶尔间还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一两句幽默风趣而富有哲理的话，接着，便有热烈的掌声和开怀的笑声在空间回荡。

22点左右，整个宴会结束了。我们返回住地时，这里早已聚集了许多人。当他们得知我是我们代表团中同主席握了手的5个人中的一个时，个个争着同我握手。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便同他们一一握手，与大家共同分享这无比光荣和幸福。

10月1日上午10时整，建国3周年庆典观礼正式开始。我在天安门西二观礼台再次目睹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风采。当百万群众尽情欢呼时，主席也情不自禁地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把整个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14时左右，持续了4个小时的观礼才告结束。

（作者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起雷英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二级战士”光荣称号）

皇甫谧

政协文史委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晚年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人，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卒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享年68岁。他的祖先皇甫谧规，后汉时曾任泰山太守，封度辽将军。曾祖皇甫嵩（皇甫规的侄儿）汉末曾任北地太守。他自幼过继给叔父，迁居到新安（今河南灵宝县）务农读书。四十岁时叔父去世，随同叔父的儿子回到故乡朝那，这时他不幸身患风痹症，一直隐居在家，“以著述为务”。

皇甫谧在他20岁时还不喜欢读书，整天游游荡荡，不务正业，人们还以为他是个傻子，叔母任氏对此深感忧虑。为了及时挽救这个青年人，任氏曾对皇甫谧关切地说：“你已经长大成人，还是这样不懂事，一不读书，二不种田，放荡无度，将来怎么办呢？”并给他仔细讲了孟母、曾父教育儿子的故事和“修身笃学”的许多道理，一边说一边哭，使皇甫谧深受感动。从此他就在家乡拜席坦为师，刻苦攻读，从不懈怠。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买书，便向别人借书抄阅，不论是种地、砍柴或放牧，都书不离手，还跋山涉水请名家指教。由于他废寝忘食的刻苦学习，当时人又称他为“书淫”。有人劝他不要过分看书，以免损耗精神，他却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在他42岁时得了半身不遂的风痹症后，他“犹手不辍卷”和“披阅不息”。为了学习和事业，他把病痛、生死置之度外，这种奋发忘我的精神为后人所敬重。

西晋时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残、贪婪、虚伪、奢侈、

颓废、放荡等龌龊行为表现得最充分的时期，这些行为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究竟学什么，为什么而学，这对于出身没落封建世族家庭的皇甫谧，面临着严肃的抉择。他既没有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又不肯颓废放荡庸碌一生，而是冲决世俗名利的羁绊，“委形待于穷而不变”，坚决地踏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终于放出了奇光异彩。他在道德、人格上，比起同时代的所谓“竹林七贤”来，要高尚的多。他一生著述甚多，医、文、史并茂，名噪一时，并成为博学多才的千古学者。先后著有《高士传》、《帝王世纪》、《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名作。他最后完成的《皇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为针灸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早在唐代，此书就被列为太医院学习和考试医生的内容之一。自南北朝至隋唐，此书已传到日本、朝鲜。国际针灸协会曾把它列为必读的基础教材。

在皇甫谧还未成名的时候，有人劝他扩大交往，博取名望，他说：“非圣人孰能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乐尧舜之道，何必崇势力而后名乎？”人们看到他贫病交迫，劝他改变一下处境，他却说：“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魏郡羡慕他的学识和品德，推举他做孝廉，他谢绝了。景元初，皇甫谧46岁，晋王司马昭为了拉拢党徒，一次征召包括皇甫谧在内的37人去做官，36人都去了，并得到了官职和封赏，唯他托病不出。太始三年，皇甫谧48岁，“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可是他又以病上疏：“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予以推却。一年后，皇甫谧49岁，又被“举贤良方正”，亦然未去，却给皇帝上表借书。皇上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的美德，“送一车书与之”。咸宁初年，皇甫谧六十一岁，皇帝又下诏说：“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认谧为太子中庶子。”他借重病为由，以示拒绝。后来又“诏征为议郎”，“召补著作

郎”等，他一概未作答应。皇甫谧对富贵、利禄和官场竟如此轻蔑，就是对自己的亲戚，也不因朝贱夕贵而改变态度。他姑母的儿子梁柳被朝廷命为城阳太守，人们劝他为之饯行，他拒绝说：

“梁柳没做官到我家来，我迎送他时门都不出，吃饭只不过是一点咸菜，今天他做了太守，就用酒肉为他送行，岂不是看重了城阳太守，而轻贱了梁柳么？”可见他的品德是多么高尚啊！

晋武帝是奢侈和厚礼的提倡者，曹操为禁止死后厚葬和立碑发布的禁令也被他废除了。皇甫谧却敢于站在当朝皇帝的对立面，主张矫俗薄葬。他认为，生死是自然规律。他在临终前，嘱咐后人，他死后要穿平常随身的衣服，用芦席裹尸，择不毛之地，挖一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的土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生不为人所知”，死要“亡不损生”。皇甫谧病故后，其子皇甫童灵、皇甫方回，“遵其遗命”，将父俭礼薄葬于灵台县张鳌坡原边。其墓后人称为“皇甫古墓”，已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皇甫谧是我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故乡的人民世代代怀念着他。清代灵台县令苏履吉曾留诗赞颂：

山中谁筑读书台？
元晏先生著作来，
载籍兼修高士传，
行踪不与俗人猜，
天还有意怜衰草，
云自无心锁绿台，
几度登临深景仰，
长留明月共徘徊。

超凡脱俗 不求名利

皇甫谧和他的《高士传》

陈 虹

晋代著名学者皇甫谧，才学出众，却蔑视功名与利禄，一再拒绝朝廷的推荐和征辟。他终身抱定一个信念：“居于田里之中，同样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去崇接世利，事官烦劳，为争名利呢？”

皇甫谧自怀高才，亦爱慕才学之士；终身不仕，亦敬仰隐逸之人。他认为，王政的首要之道，以及激浊扬清的首要之务，必当举高尚之士。于是他纵观前人对高士的记载，发现或多所阙略，或杂而不纯。他决心以严格的标准，重新选择并撰述。他为上远古、近及魏晋的数十名高士，一一立传，使其名垂千古。

《高士传》，共三卷。原书已佚，今本系后人由《太平御览》、《后汉书》等辑录而成，凡96人。在皇甫谧的笔下，有众所周知的名望之士，如协助曹参治齐的盖公，博贯五经、兼明历算的郑玄，以孝行著闻的郭太……亦有为数众多的凡人庶民，如击壤而歌的壤父，劝慰屈原的渔夫，明老子之术的河上丈人……他们尽管各自的经历大不相同，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求利禄，不仰权贵，超凡脱俗，清高傲世。在他们中间，有的终生不仕，有的中途退征。许由闻召后，洗耳颍水；段干木得聘后，踰墙而逃避。陆通高薪不就，面对聘金百镒而不屑一顾；黔娄先生高官不赴，对于卿相爵位，视如草芥。至于屡征不就者，更是不乏其人。

皇甫谧敬仰他们，颂扬他们，更每每于撰述之中揭示其隐逸

不仕的缘由。这亦是著者自身的思想，字里行间隐现着皇甫谧对时政的微妙看法。

逃避乱世于虐政，不愿为之而效劳，这是第一种。河上丈人，生活于战国之末诸侯交争之时，他亲见各国之间的兼并倾轧。驰说之士的趋炎附势，愤然而离去，隐身修道，终不复见。商山四皓，生活于秦末之际，亲见秦政之暴虐，民生之艰难，痛心疾首，退隐至蓝田山，敦聘而不至。在他们不仕与遁世的背后，深藏着对朝政时局的强烈不满与无声的抗议。

第二种，追求自由与恬静，不甘为人所挟制。楚王征召老莱子出仕，其妻断然相阻：“可食以酒肉者，能随意鞭捶他人；可拟以官禄者，能随意铁钺他人。我们分能为人所挟制。”古人深懂伴君如伴虎的危险，更懂得无官一身轻的自由。只有身无爵位方可宁静而养志。汉成帝曾对成公咄咄而威逼：“朕能富贵人、能杀人，你为何不顺从于朕？”成公坦荡而自傲地回答：“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他们抛弃了官禄，获得了安宁。在他们不仕的背后，正暗示着君主的暴虐无道。

第三种，重尊严，求知遇，不愿为人所轻蔑。列御寇隐居之时，生活窘迫，面有饥色。然而当郑穆公前来征聘时，他却毅然辞绝。他明白：“君非自知我也！”如今相聘，是因国君听从了别人的赞美之词；一旦他日定罪于己，国君亦同样可以听信他人的谗诬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穆公欲聘公仅潜为相，同样遭到拒绝。子思为此向他道出识人、用人关键：“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即是蔬食饮水，众贤士亦愿在君下风；反之，如以高官厚禄为钓耳，而无信用之心，众贤士亦将不踰君之庭。”古人曾言：“士可死而不可侮。”这并非空话。他们的不仕，正是对朝廷不重品学、不重人才风气的无言谴责。

第四种，学道至上，谦逊求实，以道行荣，以才疏为耻。原

宪匿居穷巷时，食糟咽糠，面呈菜色，然而当他面对家累千金，身居相位的同窗子贡时，却鄙弃而不屑：“无财为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我原宪，贫而无病；你子贡，方为病也。”真正的高士，谦谨自重，不窃虚名，自感才学不足，便退位让贤。东海隐者，曾居高位，然而当其自知未有忠信奇谋后，自动辞官，远隐东海，对这类人物，皇甫谧同样给予赞扬。他肯定他们磊落的品质，高尚的行为，更于暗中鞭挞那些朝廷中为数众多的尸位素餐者。

第五种，逃避封赏，抛弃名利，以义为重，以节为尊。其中有勇助伍员渡江脱险的江上丈人，他义重如山，面对千金之酬，不受而别；有大军压境之时以自己财产智退秦师的弦高，他慷慨救国，面对高昂之赏，退避三舍，远徙他乡。这类高士，重的是义、是节；轻的是名、是利。在那追求名位，贪图利禄的世俗之中，尤显高尚与超脱，倍受皇甫谧的青睐。

清朝史学家王漠对《高士传》有过评议：“谧书虽亦以自况，然犹不欲以身徇名”确实，皇甫谧终未自拟，仅于该书中溶进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名人自不附庸俗

——皇甫谧的丧葬观

赵 继 成

皇甫谧是我国西晋时代一位著名学者兼医学家。他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对许多问题都有其超凡脱俗的见解，尤其对待丧葬一事，其见解不仅高出时人，即使在今天也足显其难能可贵之处。

我国历史上的厚葬习俗起源于奴隶制之初，盛行于封建制始末。厚葬习俗对广大劳动人民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却受到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提倡。

皇甫谧虽然出身于一个世代仕宦的官僚家庭，身受封建文化的教育，但是，由于他青年时家道的衰落，使他不参加农业生产就无以维持生计。正是在这一劳动过程中，他体尝到了劳动的艰辛、物质享受的来之不易，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与不幸，加以先秦墨家思想的影响，使他对当时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厚葬制产生了深切反感、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简葬论。

他首先认为：活着的人是由气（精神）和尸（肉体）构成的。人之为死，乃是由于“气”与“尸”分离造成的。人死了之后“气属于天”而“尸不久寄”，要“与地合形”，“尸与土并”是“穷体返真之理”。因此，他主张“亲土”即不用棺，尸体直接埋入土层。他说“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

其次，他坚决反对用器物去陪葬。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葬就是藏，藏就是让人不知道，可是

厚葬者用了那么豪华的棺槨，陪葬了那么多珍贵宝物，这无异于把金银埋在大路边、使坏人产生窃墓的歹心，最终被焚尸扬尘，盗窃一空，岂不哀哉！”最后又深刻地指出：“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无不发之墓也。”

在对厚葬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之后，皇甫谧提出了自己的简葬方法。他曾对家里人讲道：我死了之后，其一：要早葬，“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其二：“不设棺槨、不加殓敛、不修淋浴。”身上不着新衣，口里不含东西。其三：下葬之时，用一张粗席把身子一裹，用麻绳将两头一扎就行了。其四：墓地不宜占用良田，但寻一不毛之地，墓坑不需深阔广大，上只需挖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之一大坑；埋葬时生平之物一律不随，只要一部《孝经》，以示不忘孝道之意。还有在墓地上不要堆土，不要种树，使谁也不知道。他允许家人哭泣，但不宜太久，不许家人为其守墓。他认为古人不守墓是明智的，而今人守墓则是愚蠢的。

皇甫谧卒于西晋太康三年，活了六十八岁。他的儿子遵循他的遗命，完全按照他生前的嘱咐安葬了他，最终实践了他的简葬主张。

唐 宰 牛 僧 孺

陈 文 炳

牛僧孺是甘肃的一位历史人物。他既是政界的贵胄，又是文坛的名士。

牛僧孺，字思黯，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公元847年），他一生六十九年中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个皇帝。这正是唐中期以后走向衰亡的历史时代，这期间，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因此，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朝臣中世家出身的与科举出身的党派斗争，非常尖锐激烈。各派政治集团你上台，他下台，像走马灯似的。朝廷对宰相的更换极为频繁，而一个宰相的更替、贬斥就相应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调换。官宦巨族的斗争，皇帝成为掌权的党派利用来打击对方的棍子。其时，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社会动乱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经走向末路了。牛僧孺所处的就是这样的时代。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二十五岁的牛僧孺高中进士，步入仕林。这使他看到了腐败政治的一些内幕。公元808年，唐宪宗制举贤良方正科的特试。牛僧孺正血气方刚，胸怀治国韬略，在策对中毫无顾忌地皆陈时政。他的胆略见识深为考官赏识，成绩被列在上等。但是，对朝政的指责却得罪了当朝宰相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击，久不得叙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后，牛僧孺才得重用，被提拔做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

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后，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专管弹劾（检举官吏过失）之事。这时，他精神大振，